

纵乐的

困惑的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加〕卜正民 著

方骏 王秀丽 罗天佑 译

方骏 校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Timothy Brook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by Timothy Brook

Copyright © 1998 Timothy Brook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everley Slope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 (加) 卜正民著；方骏，王秀丽，
罗天佑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495-8750-6

I. ①纵… II. ①卜… ②方… ③王… ④罗… III. ①商业史—研究—
中国—明代 IV. ①F7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19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 字数：264千字 图片：53幅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中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最喜爱的一章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

——张瀚（1511—1593年）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张涛（1609年）

英文版序



1634年夏天，杰恩·尼克雷（Jean Nicolet, 1598—1642）从法属殖民地魁北克出发，到五大湖地区去解决那里的部落冲突——这些冲突威胁着加拿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毛皮贸易。尼克雷还受命在可能的情况下，航行到“西洋”。当地的土著居民带他去密西根湖，他深信，大湖的对岸就是中国。为了给中国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准备了一些他认为在拜见中国人时会用得上的合适物品。我们不知道尼克雷如何得到一件织有花卉和彩鸟的中国锦缎，只晓得到1634年时，丝织品从中国传到欧洲只有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他穿上缎袍，渡过密西根湖，结果仅发现了格林贝。

这一错误让我们发笑，因为它与我们现有的知识大相径庭。但

对尼克雷来说并非如此。我们现在距离明朝如此遥远（尼克雷在它覆灭的两年前溺亡），以致忘掉了中国曾经如何点燃起欧美的贪婪和欲望。

马可·波罗的游记被欧洲人争相传阅，受这本书的刺激，欧洲冒险家如哥伦布、探险家如尼克雷等人梦想，他们在世界另一端所发现的中国，将会是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拥有富丽堂皇的快乐宫殿和无与伦比的财富的世界。他们同时也寻找另外那些更为实在、具体的东西：瓷器、尼克雷所穿的丝绸、大黄，以及其他一些明朝所产的珍奇物品。由于这些人工制品在欧洲可以卖出惊人的价钱，欧洲人纷纷寻找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航海线路。加拿大的发现，就是地理计算错误而引发的历史意外的后果之一，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地理计算错误，其诱因便是明代的中国。

尼克雷的冒险行动并不是完全失败。他解释道，当他身着多色缎袍出现在土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以为他是神，很虔诚地答应不再阻挠毛皮东运。我们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是否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同法国人的商业来往，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尼克雷划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支流去“西洋”简直是发疯。最终尼克雷放弃寻找去中国的西北通道的努力，失望地返回了魁北克。

让我们细想一下尼克雷的错误。也许我们和他一样，从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看世界。我们习惯地认为欧洲是尼克雷时代的世界中心，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后来欧洲确实成了世界的中心。但在尼克雷时代，欧洲并非世界的中心。欧洲人也许已经具备了环航全球的技术能力，但是他们的“贸易”并非建立在市场

或国内自身充足生产的基础上。这种“贸易”依赖掠夺和奴役他人，破坏既有的交易网络，以极低价买入金属、毛皮和香料，然后高价售出。尼克雷想从中国购买物品，但他没有东西出售，他所能提供的只有银子——中国人眼中值得进行贸易的真正货币。他寻找去中国市场的路线的事实提醒我们，明朝时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本书即是对那个中心的描述。它不是一部明朝经济史（目前说来，写一部精确的明朝经济史还不可能），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它关于商业对明代社会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的某个“长时段”（*longue durée*）里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

我对明朝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度过的学生时代，在李庆甲教授的介绍下，我初次接触到了晚明哲学家的著作。那是1976年的那个令人惊悸的春天，当时上海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徘徊于上层政治和“四人帮”的排商主义，以及淮海路上日趋时尚的世界之间，在那里，微弱的商业本能正千方百计地试图越过政治警戒线。那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开始以一种让许多国人感到震惊的速度，迅速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滑向市场经济，在七十年代末激起对“思想贫乏”的焦虑，进而走向八十年代更为普遍的文化危机。处在如何调和追求利润与保持道德水平的欲望的两难中，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发觉他们再次生活在类似晚明时期的矛盾环境当中。从九十年代的角度来看，当金钱变成无可争辩的主人，都市性爱和各种奢华交易达到晚明那样的程度，虽然明

末那场辩论现在看来似乎很遥远，但对在国际分工中找到其位置、原有道德体系日趋解体的中国来说，这样一个匆匆的回顾显得很有必要。

明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当我将这一变化呈现给读者时，我清楚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我没有经历中国自七十年代以后从农村农业经济主导转变到城市商品经济主导的浓缩旅程，我也许不会构思写这本书，或不会用眼下的方式来写。这并不是说本书的叙述源自明代以外的材料，只是想承认，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

我必须向牟复礼（Frederick Mote）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致谢，他们请我为《剑桥中国史》第八卷撰写有关明代交通和商业的一章。当我发现无法将自己想写的全部内容放进那一章以后，《纵乐的困惑》便应运而生了。我很感激杜先生给我相当大的自由，让我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完成他交代给我的使命，并鼓励我继续撰写本书。

我的多伦多大学同事王贞平、博士研究生方骏和张云秋，在此研究项目的初期阶段，多有贡献。我很感激保罗·伊普瑞尔（Paul Eprile）为我阅读本书的第一稿，让我在第二稿走上正轨；戴福士（Roger Des Forges）审阅第二稿，并提醒我把对明朝商业发达的热情评价调整到一个恰当的程度；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告诫我在第三稿里避免把明末经济简单化的若干倾向；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让我始终不要忘记将明代中国放在全

球的环境里来思考。我的出版代理人贝弗利·斯洛彭 (Beverley Slopen) 帮助让此书以我所希望的面目呈现给读者，我也十分感激她对我的写作的信心。我很高兴有机会同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希拉·莱文 (Sheila Levine) 合作，她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鼓励我。

最后，我要向好友王国斌和我的夫人菲·希姆斯 (Fay Sims) 致以特别的感激。国斌以学者的博学和朋友的关心审阅全书；菲帮我寻找适合写作的时间和地方，让我可以在眺望休伦湖蓝色湖水的同时，完成这部书稿。我常想：当年尼克雷面对休伦湖时可曾有类似的心情？

中文版序



当人们最后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们正顶着非洲的烈日，望着大河的对岸。三人中，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非洲黑奴，另一个是待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下的葡萄牙人。他们因所乘坐的船只出事而滞留在今天我们称作纳塔尔的非洲东部，同行的其他人已经涉水过河，消失在这片干燥和荒芜的大地上。我们不知道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姓名，但葡萄牙人是个叫做鲁博（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的商人。1647年2月当鲁博离开澳门的时候，他也许是那里最胖的人。他于1638年来到澳门，接任船队总管一职，不巧他在曾经十分赚钱的远航日本商业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购买了这一航海专利，不能从中致富，他转而交结耶稣会士，不择手段地掠夺澳门的

财富。当皇家行政官员对他有所阻挠时，鲁博在1643年找人将他打死。鲁博的行为在澳门街头引起的骚动并不像当时席卷华北大地的反明叛乱那样严重，在明朝被推翻的1644年，这位船队总管被新任澳督卡瓦荷（Luis de Carvalho de Sousa）拘捕，但后者未能成功没收他的财产或对他提出指控。1647年2月，卡瓦荷最终将鲁博押上开往里斯本的船只，让他去那里接受审判。

五个月后，鲁博所乘坐的船只在非洲东南海岸失事，生还者需要从内陆徒步走到莫桑比克。鲁博因过度肥胖，加之长期奢华的生活方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每走几步就要歇一歇。起先他用钱雇些士兵用吊床来抬他行走。但几天之后，当这群人的食品用尽后，那些脚夫的精力和耐心也没了。在一条大河边，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抬他过去，于是为他搭了个简易帐篷，留下两个侍者后走了。

那位非洲人是葡萄牙奴隶贩子在桑给巴尔海岸购买后被送到澳门的。他是澳门众多没姓没名的黑奴之一。他们的容貌让中国人吃惊，当地人叫他们“黑鬼”。虽然纳塔尔在非洲，但船只在那里遇难对这位黑奴来讲，并不意味着可以返回家乡、解除奴隶身份。关于那位中国人我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他身材短小。他也许是鲁博在澳门雇来的侍从，也许是厨师，更可能是一个自己主动或儿时被人绑架后卖给外国人的奴仆。虽然奴仆在晚明相当常见，但贩卖中国人给外国人却是违反明朝法律的，明朝的地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忧心了几十年。一位官员于1614年前后在澳门竖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项葡萄牙人应该遵守的规定，其中第二条是他们不可以购买“唐人子女”，但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的屏障都不能阻止其他

地方的中国人涌入澳门，“每岁不知其数”，正如当时另一位明朝官员抱怨的那样。至少在穷苦劳工的眼里，在澳门做奴仆比在福建打工要好。明朝的官员们也许不这样想，但将中国与外国人隔开的想法及做法并不能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因为同外国人做生意所带来的利润实在太可观了。

当同船的其他人丢下鲁博、渡河而去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位中国奴仆留在他身边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因为鲁博的名声太坏了。继续帮主人做饭？这更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剩余食品了。作为奴仆，在主人给他离开的自由之前，他是不能走的。一旦鲁博死了（这肯定很快就发生），他才有可能被解放。但那时他去哪里？那个黑奴后来又怎样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基本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中国人死在纳塔尔，也许是独自一人离开尘世的。

这位中国人只是生活在明代的数千万人中的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生老病死都在中国境内，但有些不是，而且这些人的数目在王朝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十六、十七世纪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一样。当时的世界正在日益变小，许多人（不光是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来来去去。财富和机会的引诱使得某些人长途跋涉，但更多的像那位非洲奴隶，是被强迫而不是被机遇拖进这种空间移动里的。那位被带到澳门的中国人应该也是这样：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或仅仅为了生存。不管是哪种情形，席卷十七世纪多数地区的追求商业利益的潮汐，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将他从中国的南方海岸带到非洲海岸。

1368年明代中国人的生活与1644年他们后人的生活有许多不同，前面讲的这个故事显示了其中的一个。本书是有关明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叙述。我写此书时，留意到这些全球趋势，虽然这些趋势应被看成是影响明朝中国历史的诸多复杂因素中的一部分。那位在纳塔尔的中国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所处的世界在变化，也告诉我们中国内部的变化：商业活动正日益作为一种致富的手段而被人们实践和称颂，中国不再以明朝开国君主洪武皇帝所希望的方式与世隔绝。这个故事挫败了洪武皇帝对中国的希望，我希望也挫败读者的期望。几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看起来也许熟悉，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小心。明代中国人居住于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那些相似的东西也许并不相同。

作为欧洲人后裔的加拿大人，我的社会文化背景似乎使我同鲁博而不是他的中国侍从更加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或更加理解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看法也许会妨碍我捕捉构成那位中国人生活经历的某些细节，但它同时也替我免除了那种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而自认理解他的幻觉。当然，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生活中。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他们书写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中国的，我写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历史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

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对像我这样不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讲，明朝是一种可以作为我的遗产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拥有这种没有民族义务的自由。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因为从这一立场我们可以像十七世纪的祖先一样，审视那位被困在纳塔尔的中国侍从、非洲奴隶和葡萄牙商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认为，那位富有、肥胖和腐败的鲁博是他们中间最奇怪的一个。

我很高兴广大的中国读者现在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这要归功于我的学生和朋友方骏。我很感激他愿意承担此书的译介工作，也很欣赏他非凡的翻译技巧。我的散文写作风格并不简单，但他和他的合作者王秀丽、罗天佑极其成功地将之译成中文。我还要感谢孙竞昊为本书所提供的出色的编辑工作。

中文新版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撰写此书时，我清楚知道读者将要看到的明朝故事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发生的转变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我并不希望过多地强调这些相似之处，以免读者将我对明朝从备受控制的乡村秩序到混乱无序的商业实践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当作我自己的虚构，并赋予五百多年前发生的事件一些不属于它们的形态和意义。我是不是从窗子里面往外看，把我所见到的映像误作为五百年前的事实？我相信我所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强加给历史的东西。从七十年代留学复旦大学开始，二十多年阅读明代史料的经验给了我撰写本书的自信。那之后，另外二十多年继续研习这类史料的岁月让我更加肯定，本书所描述的商业活动和民

众困惑确实属于那个时代。虽然我在审视明代风景时留意到一些与当今中国奇特的相似之处，我并没有写到书里。

尽管这么说，我仍然乐意承认，历史是今人从现时的视角书写的，我们无法离开自己的角度去看历史。随着时间的前移，人们观察历史的有利位置会随之变化，我们过去所发现的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变，这就像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样。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

我在书写明朝历史时所采用的视角，亦见于其他学人。事实上，我觉得《纵乐的困惑》是我这一代历史学家和朋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用新的方法探讨中国历史的“三书系列”的一部分。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是从社会底层看历史发展，重点是明代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世界考察中国，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一个有着相似发展经历的世界背景下进行比较。另一部著述是王国斌（R. Bin Wong）的《转变中的中国》，出版于1997年。作为多年的大学同窗，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一起回应许多彼此关心的问题。他的研究对象是清朝，方法是从上层即从国家而非社会层面来书写历史。通过对中国与欧洲进行严谨的对比，他希望做出更为有力的比较分析，不从外部看中国，而是用中国来重新考察世界其他地区。换句话说，王国斌认为历史比较应该是对称的而不是单向的。第三本书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年面世。彭慕兰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比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更加类似

欧洲经济，这两个地区只是到了晚近才开始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也是从外部世界看中国，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们三位的共同之处是，我们撰写上述三书时，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转型期，在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伴随而来的困惑。当时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出众地发现了前代西方学者未曾看到的历史，但其实我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所提供的视角出发，告诉读者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师长错过了我们观察到的历史风景，而是他们站在跟我们相异的火车轨道拐弯处，看到了与我们所见不同的历史。

上述回顾只是想提醒读者，历史学家就某个研究课题所写的任何内容都绝不是盖棺定论。探索历史真相的道路对新一代历史学家始终是敞开的，他们在火车轨道的新位置，会告诉你不一样的故事。你只要确保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